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于无声处》专集

(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各专集，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1. 作家传略
2. 作家的生活与创作
3. 评介文章选辑
4. 作家著作目录、作家作品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五)茅盾同志为本书封面题辞，有关作家为本书提供了宝贵资料，许多同志给予热情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六)本专集由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魏照风、柏彬同志编选。

(七)由于水平所限，时间仓促，错误缺点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五月

前 言

(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是参加协作编写的二十所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学、科研内部参考用书。

(二)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协作编写的单位有：山东大学、山东师院、广西师院、上海师大、上海戏剧学院、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大、华中师院、江苏师院、扬州师院、沈阳师院、河北师大、杭州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师院、浙江师院、徐州师院、福建师大等二十所院校中文系。

(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拟分批编选作家作品研究专集。

一九七九年计划编印的有：

《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包括郭沫若等近百位作家)

马烽、巴金、王汶石、王愿坚、艾芜、田间、老舍、冰心、刘白羽、孙犁、沙汀、李季、李准、杜鹏程、陈残云、张天翼、周立波、周而复、杨沫、杨朔、玛拉沁夫、欧阳山、贺敬之、胡可、草明、柳青、闻捷、赵树理、姚雪垠、徐迟、秦牧、峻青、茹志鹃、夏衍、郭沫若、郭小川、郭风与何为、梁斌、曹禺、臧克家、魏巍等作家研究专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天安门诗抄》、《于无声处》、《丹心谱》、《甲午风云》、《江姐》、《刘三姐》、《红岩》、《红日》、《林则徐》、《林海雪原》、《杨开慧》、《阿诗玛》、新民歌、《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等作品研究专集。

目 录

(一) 作者简介.....(1)

（二）作者谈创作

写在《于无声处》发表的时候.....宗福先(3)

我以我血荐轩辕

——记陌生的朋友……………宗福先(7)

谈《于无声处》的创作.....宗福先(12)

(三) 评介文章选辑

戏剧舞台上的一声惊雷

——评话剧《于无声处》

.....赵 寻(18)

出鞘的利剑 滚动的惊雷

——赞话剧《于无声处》

.....穆 靜(28)

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

——读《于无声处》随想

.....刘心武(32)

人民的愿望 人民的力量

——评话剧《于无声处》

.....《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40)

寒凝大地发春华

——评话剧《于无声处》

.....王家熙(56)

时代的号角

——评话剧《于无声处》.....赵云声(63)

从生活出发 揭示深刻的社会矛盾.....王永生(69)

悲壮的颂歌 战斗的艺术

——赞话剧《于无声处》

.....杜清源 李振玉(74)

《于无声处》三人谈

.....曹 禺 赵 寻 宗福先(87)

壮怀激烈 慷慨悲歌

——向《于无声处》学习

.....吴谨瑜(96)

《于无声处》的艺术构思.....李汉秋(105)

话剧《于无声处》人物座谈会.....顾小虎(112)

(四)史料

天安门事件真相

——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

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人民日报》记者(118)

(五)目录索引.....(147)



作者简介

宗福先，男，一九四七年生，江苏常熟人。一九六四年毕业于上海市延安中学初中部，毕业后，因病在家休养。一九六八年随同一九六六届毕业生一起分配到工厂，现为上海热处理厂工人。

宗福先同志的父亲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市民建副主任，母亲系中学的语文教师，他们都爱好文学，这对宗福先的影响较大。宗福先同志从小就接触了各方面的知识，阅读的书籍比较广泛，文学基础较好，平时十分喜爱戏剧，对曹禺剧作尤为喜爱。

一九七四年底，宗福先同志参加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第二期业余话剧创作学习班，因写作基础较好，学习班结束后就留在市文化宫戏剧创作组搞一些创作，这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四人帮”宣扬的“主题先行”、“三突出”等谬论，也曾影响过宗福先同志的创作思想。粉碎“四人帮”后，他主观上很想多写一点反映这场斗争的作品，曾先后和其他同志合作写了三、四个剧本，但都失败了。后来，看了大量的古今中外

的优秀作品，从中得到了启发，吸取了养料。体会到要写出能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发生的这场尖锐斗争的作品，必须首先砸碎“四人帮”套在思想上的精神枷锁，恢复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要从生活出发。宗福先是在经历了这样一场艰苦的“自拔”过程后，于一九七八年初着手创作话剧《于无声处》的。

宗福先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开始酝酿，构思成熟后，五月下旬动笔，三个星期后，也即六月中旬写出初稿。

宗福先同志学习刻苦，接受能力很强，思考和分析问题也比较深刻。他还写过小说《入党》(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散文《我以我血荐轩辕》(发表于《上海文艺》)等。



在授奖大会上



写在《于无声处》发表的时候

宗 福 先

一九七六年那个令人难忘的清明节的第二天，我偶然地遇见了一个刚从北京来、路过上海的陌生的朋友。从他嘴里我才知道这些天在天安门广场上，首都人民为周总理举行了世界上最庄严、最圣洁的祭奠。他为我展示出一幅悲壮、雄伟的画面：花圈成山人似海，黑纱遍地泪如雨。这个消息对于我是陌生的，可这种情感、这种气氛，对于我却是熟悉的！听着听着，我热泪盈眶……

我们站在北站旅馆的大厅里。他全然不顾周围川流不息的人群，直呼其名地诅咒那几个“狗男女”，咬牙切齿地痛骂当时的《文汇报》。他说：“这次有人说我是‘跳出来了’，是的，有人反周总理我就非‘跳’不可！我是准备豁出命来干了。这是我拿自己都没办法的事。而且，看来这次是要流点血了……”当时，他和我都还不知道，由于“四人帮”的残酷镇压，这样的流血事件，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发生了……

他知道我想学习创作，临分手时说：“现在不是写东西的时候，可是你要加倍地注意观察。越是在这种时候，各种人的真实面目也就暴露得越充分，你把他们全都记下来，将来总有一天会用得着的！”

就在他离开上海以后的第二天晚上，“四人帮”把他以及千千万万在天安门广场上挥泪悼念总理，洒血讨伐奸贼的群众统统定为“反革命”、“暴徒”。

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在“四人帮”制造的白色恐怖下，在上海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在一片沉默之中，我怀念着远方那个连地址也没留下的朋友，反复回忆着他那几句朴实简单的话，我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名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终于，中国的大地上响起了十月的惊雷！

那几天，走在欢腾的游行队伍里，站在欣喜若狂的人海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人民不会永远沉默！人民是总归要胜利的！这就是我写《于无声处》的最初的所谓创作冲动。

我还想试着写一写我周围的、我所接触过的、我所听到过的那些人，朋友、亲戚、同学、同志，他们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的意志、愿望、思想、感情。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每个人的心里，在每一个家庭里都掀起了怎样的风暴啊！确实，它洗净了革命者的灵魂，也冲去了各类小丑脸上的油彩。生活中有那种经受了非人的折磨、被“四人帮”开除了党籍以后，仍然对党抱有坚定信念的老干部，也有为了保官、保命不惜叛卖自己亲人的败类；有一些人被迫可怕地折磨自己，用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示自己对现实的愤懑，也有一些软弱的人从斗争中锻炼得勇敢坚强

……不论是几十年的患难夫妻，还是青梅竹马的对对恋人，人们的信仰，人们的道德，人们的思想，人们的感情，一切的一切，全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有的人在考验中堕落，更多的人在考验中觉醒和成长。

我是多么想用自己幼稚、笨拙的笔把这一切统统写出来啊！

粉碎了“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后，我这个青年工人才有机会读到许许多多老前辈们优秀的文学作品，从中吸取营养。特别是学习了曹禺同志的剧作之后，我一直向往着能不能象小学生写描红簿一样，试着学学他的创作手法：利用人物、时间、地点的凝练和集中来细致、深入地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冲突，通过家庭矛盾这个侧面来反映丰富、深刻的社会矛盾。

于是，我写出了这篇习作《于无声处》。

从初稿出来一直到排练、演出、再修改，得到了各方面的领导、老师和同志们的关怀、扶持、鼓励、帮助。可以说，这个戏是集体力量的结晶。我想，只有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象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人业余作者，才能得到如此众多而巨大的“外援”。这一切，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剧本现在还有许多毛病。例如：有的人物形象还不够鲜明、准确，甚至还有较大的矛盾；概念化的、带有帮腔帮味的东西还时有出现；结构上没有做到有张有弛，该松的地方松不下来，该紧的地方就紧不上去，平了；有些地方人物上下场太多太碎、且不合理；第四幕戏散了、乱了……这些都还有待于在各方面老师、同志们的帮助下，在实践中认真修改。发表这个很不成熟的演出本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努力把这把投向“四人帮”的匕首磨得更快更

亮！这是我的心愿。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那些严肃地给我“敲木鱼”、“泼冷水”，要我力戒骄傲的同志们。确实，在我初学步的时候，不仅需要老师们在艺术上的搀扶，更需要政治思想上的关怀、爱护。今后的路还长，我一定不辜负党和同志们的期望，踏踏实实地往前走，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我以我血荐轩辕

——记陌生的朋友

宗 福 先

话剧《于无声处》已经演出了，许多熟悉的或不熟悉的同志都来刨根问底：你怎么会想到要写这个题材的？触发点是什么？你酝酿了多少时间？三个月？五个月？……

其实，这个题材在我心底已经埋藏了两年多了，还是在一九七六年那个令人难忘的四月五号的第二天——当时除了在北京的人以外，我们都还不知道；不过，上海的空气已经是明显地紧张、沉闷了。那天，我偶然地遇见了一位从不相识、以后也再也没有见过面的陌生的朋友。

他是从北京去南方，路过上海，受人之托到我这儿来取东西的。一见面，他就给了我一个朴实淳厚的印象：中等身材，戴着眼镜，穿着很“土”。他不善于应酬，我也不喜欢说客套话，没谈三五句，我们就扯到在当时是“犯忌”的“国事”上去了。

从他嘴里我才知道，几天来，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上为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举行了世界上最庄严、最盛大的祭奠！能容下百万人的天安门广场，如今却容不下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无限哀思。到处听得见人们哀恸的哭声：周总理，你在哪里？到处看得见人们用鲜血写成的誓言：红心永向领袖，擒妖甘献我头！在那些最圣洁的日子里，松树开花了，绽出一

朵朵纯净的小白花；人民英雄纪念碑说话了，向着万里长空悲愤地倾诉着人民的心声。几十万，上百万无组织的人群（因为谁组织谁就是犯罪！）涌进广场，却把这里变成了世界上最有纪律的地方；也许周围你一个人都不认识，但你见到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马上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

我静静地听着，禁不住热泪盈眶……

“对周总理的怀念，把我们的血管全接通了。这回路过南京，南京人也是这样。”突然，他沉默了，片刻，锐利地看了我一眼：“你们上海人……”

“上海人”！确实，有一段时候在某些地方，“上海人”成了不祥之词。据说，有些外地人见到上海人就嗤之以鼻，冷眼相看，甚至拍案而起。我倒并不想过多地责怪他们没有对上海人做分析，相反，我从中更多地看到了他们那种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的强烈感情。但无论如何，轮到我自己当面听到这种刺心的话，也生气了。清明节上海的街头确实没有如山的花圈、似海的人群，可除了数得出的几个败类，几乎每个上海人的家里都恭恭敬敬地悬挂着周总理的遗像，在那上边，都扎着一朵同样圣洁的小白花……

我忍不住脱口而出：“上海人也是中国人！”

他不响了。

我默默地拿出在周总理逝世的那几天里写的一首《满江红》。平仄不对，文理不通，但这却是我从心底哭出来的：

噩耗惊梦，
真似梦，
但求是梦！
怎抵挡，

丝竹哀泣，
欲轻还重。
黑纱遍地江河冷，
悲风万里云天。
想总理，
何处觅遗容？
在心中。

拒胡马，
傲霜露，
折残戟，
擎天栋。
任鸦噪犬吠，
青松高耸！
今日忠骨洒九州，
来年化作宏图涌。
踏足迹，
后人跟来处，
旌旗动！

他看了两遍，不无激动地说：“鸦噪犬吠，哼，不过就是江青、张春桥那几个狗男女！”

我吓了一跳。对于那几个“狗……”我也一向腹诽很多，老大不敬，但直起嗓门来这么公开地骂，我还不 敢。要知道，那时候凭这一句话就能叫你去蹲大狱！

他仍然没有降低嗓门：“他们已经犯了众怒，把老百姓都惹火了！快了！”

也许是由于种种限制吧，有时候我有些悲观，认为中国人受封建思想影响太大，忍耐精神实在太好了。可今天，我怀疑了：人民真的会永远沉默吗？

他感慨系之地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也是个‘老造反’，老红卫兵，后来发现有人想利用我们，所以对这两年的某些‘路线斗争’，我是兴趣不大了。可这回，有人问我，你怎么又跳出来了？我说，没办法，有人反周总理我只好‘跳’出来，非‘跳’不可！这是我拿自己都没办法的事。我是下决心豁出命去干了！而且，看来，这次是会流点血的……”

当时，他和我都还不知道，这样的事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发生了……。

临走，他握住我的手说：“你喜欢写作，这很好，可现在还不是写东西的时候。不过，你一定要加倍地注意观察。越是在这种时候，各种人的真面目也就暴露得越彻底。你注意观察，很有意思！你全都记下来，将来，会有用的！”

他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想：将来，我首先要写他，写这次象闪电般短暂而印象强烈的会见。

就在他离开上海的第二天晚上，“四人帮”把他以及千千万万在天安门广场上挥泪悼念总理，洒血讨伐奸贼的人们统统打成了“暴徒”、“反革命”。

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呵，那以后是一段怎样沉闷的日子啊！

特别是我们在上海的人们，感到阵阵窒息。我曾经请求一位同志替我画幅油画：《为了忘却的纪念》。我自己设计的画面是，鲁迅先生站在客栈的院子中，悲愤地向着漆黑的夜空长吟：“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但，终于没有画成。

不过，我还是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位陌生的朋友的那些话，记得天安门广场上空上百万人的呐喊声！

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多年的教育下，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在政治上是成熟了！我默诵着鲁迅先生的名句：“于无声处听惊雷！”

终于，中国的大地上响起了十月的惊雷！

胜利了！解放了！置身于欣喜若狂的上海人中间，置身于人民中间，我又想起了远方的那位朋友……

那以后，我一直想把这一切都高声地喊出来：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我于是拿起了自己这支幼稚而笨拙的笔。……

（摘自 1978 年《上海文艺》11 月号）

谈《于无声处》的创作

宗 福 先

下面谈具体构思的过程：

我是七四年底开始写戏，“四人帮”粉碎后，我连写了四部戏，主观上愿望良好，但一下笔就露馅。还是四人帮时那一套。作品中没有人，除了神就是鬼。但实际生活中，却既无神又无鬼，只有人，形形色色，活生生真实的人。过去不敢接触人，一碰就是人性论。四人帮喊的很响：只有国家的命运，革命的命运，没有个人的命运。七二年元旦我写了个剧本，还是一个工程，两条路线，三个回合的套子。把人配到工程里去。有很多人嘴上不关心政治，实际上时时刻刻在关心政治，象何为那样，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关心政治，因为政治和人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休戚相关。大家为什么对粉碎“四人帮”那么高兴，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每个家庭都在这十年中卷起了风暴，每个人的思想、道德、感情受到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有的人堕落了，便更多的人升华了。所以，想通过写人来反映一下文化革命，特别是七六年与“四人帮”的斗争。文化革命是怎样洗炼了人的灵魂，又是怎么冲去“四人帮”一伙脸上的油彩。是不是一写人的内心矛盾就是写双重性格呢？对每个人都要一分为二嘛。文化革命就是把人摆到一个最大的矛盾里来冲击。在这过程中，人民才成熟起来，离开这些事写什么呢？我写的六个人基本上没有离开身边熟悉的，过去一写东西就觉得生